

# 16至20世纪中叶民间文献中 有关家族婚姻状况的研究

——对江南洞庭席氏家族的考察\*

马学强

**【摘要】**洞庭席氏家族为江南望族，迄今已延续千余年，族内所修家谱及所存其他文献资料较为丰富。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其分支众多，各支各脉的情形不一，加之职业差异，居住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不同人群的婚姻选择又具有不同的特点，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梳理相关文献资料，可以勾勒出洞庭席氏婚姻状况以及婚姻圈的变化。从席氏家族婚姻的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还与该家族经营网络的形成与扩展有密切关系。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见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

**【关键词】** 江南； 席家； 婚姻； 网络

潘光旦先生在研究明清两代嘉兴地区望族时，非常注意族与族之间的婚姻关系，他认为：“望族之形成，除了种种环境的条件而外，自亦有其遗传的因缘，遗传的因缘又可以分两部分说，一是血缘，二是姻缘，姻缘与血缘虽不能完全划分，但先得有姻缘，然后可以有血缘。如今以往的种种地方氏族的作品，几乎全部只注意到了血缘，并且只不过是父系一面的血缘；一若此种血缘的形成和母系全无干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挂漏。”<sup>①</sup>这段话对于研究家族史的人来说，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提醒。的确，在研究家族历史时，大家关注较多的是祖孙父子之间的血缘关系，而对母系或家族间的姻缘问题有所忽略。事实上，在民间文献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婚姻状况的资料，对此予以梳理，可以反映出不少问题。本文以江南洞庭席氏家族为个案，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见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

—

一些西方学者在研究欧洲家庭史时，可以列举大量包括教区的登记册、法庭检验遗嘱的记录、家庭消费物品的清单等原始凭证或资料，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所引用的这些材料在时间上又往往比较连续。“16世纪与19世纪之间，从人口方面来说，欧洲各国家庭史已经相当清楚。这是因为系统地进行了几次人口统计及地籍造册资料可以使用。特别是从15世纪末开始，在欧洲数国的许多主教管辖区里已经对受洗、结婚和丧葬进行登记。”<sup>②</sup>利用相关资料可以探讨欧洲社会的人口结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关系、经济收入、消费情况以及其财产的传代等问题。反观同一时期涉及中国人家庭方面的数据特别是连续性资料则比较缺乏。其深层的因素，在于中西方之间社会结构的差异以及管理体制的不同。然而，从中国历史文献的实际情况出发，我们有自己的资料来源、记录方式，诸如一些家族注重本族的

\* 本文为作者承担国家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中国江南地区一个家族的变迁：洞庭席家研究”（项目批准号：03CZS010）的一部分。

<sup>①</sup> 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载《潘光旦文集》（3），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58-259页。

<sup>②</sup> [法]安德烈·比尔基埃等主编《家庭史》（第3卷，现代化的冲击），袁树仁等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5页。

历史，保存了不少家谱、祭祀记录乃至一些帐册等，其中，就有不少内容可以反映家庭的婚姻等相关问题。

洞庭席氏家族为江南望族，迄今已延续千余年，这个家族在近几个世纪编修了数十种家谱，并保存了其他文献资料，部分涉及席家子弟的婚姻状况。该家族婚姻资料的连续性与相对完整性，为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洞庭席氏家族自唐代后期从北方迁居江南的太湖边，聚庐托处其间，子姓繁衍，逐渐成为洞庭东山巨姓。明代以来，席氏家族在商界的声名渐起，涌现出不少富商大贾，其中部分是席洙的后代。席洙，字子文，号怡泉。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生。在洞庭席氏家族中，已为第27世。他以居积起家，多年经营，颇有资产。与一般的商人不同，席洙熟读诗书，在有了一些家产后，更安心于读书，修身养性。当地县志称他：“孝友醇谨，达观身世，读书自乐”。<sup>①</sup>席洙对家族的贡献，不在于积攒了多少钱财，也不在于拥有多大权势，而在于“立言”。他集数年之力，用心撰写了一部叫《居家杂仪》的书，对洞庭席氏子弟的影响极其深远。

先来看席洙本人的婚姻情况。席洙原配金塔村郑氏，继朱氏，“皆相继没”，再继西泾村吴氏。<sup>②</sup>郑氏、朱氏、吴氏均是东山当地人。有四子：端懋（观源）、端楚（澄源）、端樊（左源）、端攀（右源），其中，端懋为郑氏生，端楚为朱氏生，端樊、端攀两兄弟为吴氏生。席洙在世之时，家规甚严，保持了一个大家庭的规模。明万历十年（1582年），席洙去世，之后分家析产，从一些记载来看，不久家庭就出现了纠纷，一个孙子在端懋去世后，“屡有违言”，估计是为财产分割，与几个叔叔发生了矛盾。端樊、端攀“乃拂衣辞去”，又念母亲吴氏在家，不忍远贾于外。于是，兄弟俩先到邻近的青浦经商，“共权子母，逐什一之息”，开起了典铺。母亲吴氏非常支持他们，还拿出陪嫁时的金银首饰，“以佐之”。左、右源后成为明代后期的著名大商人。

席左源、右源兄弟因经商在外，其婚姻状况又如何？席左源的原配乃本山殿后沈氏，为庠生沈余烈之女。<sup>③</sup>继临清王氏，在家谱记载“貳山东临清州王氏，生万历三十三年乙巳，卒康熙十七年戊午”。<sup>④</sup>从资料来看，席左源与原配沈氏相差1岁，而与王氏相差39岁。席左源当年“遣宾客子弟，北走齐燕，南贩闽广，不二十年，资累巨万。”<sup>⑤</sup>而临清是一个重要经商据点，他曾长期在那里设肆经营，显然，他是因为经商而在那里继娶王氏的。席左源有三子，即本广、本久、本彝，其中本广、本久为沈氏所生，所谓“嫡出”，本彝乃王氏生，所谓“庶出”。再看右源的婚姻，配本山后巷吴大宾之女。有一子，即席本桢。

席洙孙辈的婚姻状况，此以席本久、席本桢为例。席本久是左源的次子，家谱中只有寥寥数语：配东山金湾姜氏，继青浦沈氏。其实，那时的家庭情况远非如此简单，另据当时人的记载：本久“元配姜贤而无子，尚出奁中金置二女为翁备侧室，及冢子甫生，翁即择对庀妆具嫁遣之，其最后买者侍翁弥年，既嫁犹处子也。由是里党翕然推服。”后来，他在青浦经商，又娶侧室当地人沈氏，有二子，曰士琨，曰士巧，皆太学生，候选州同知。有三女，分别嫁给诸生严（宗龙）、徐（夏）、诸生蔡（光祖）。这些子女“皆沈出”。<sup>⑥</sup>席本久经常往来于太湖、泖淀之间，在朱家角镇中市下塘筑“澹香别业”。

席本桢先后娶四房，其中，原配乃叶巷吴成名之女，同岁；继娶叶巷叶氏，比他小10岁。吴氏、叶氏都没有生育；再续江宁府延啸云之女，延氏比本桢小14岁；后又续江宁府

<sup>①</sup>《吴县志》卷70上，“列传孝义一”。

<sup>②</sup>《席左源公支家谱》卷2，及张鼐：“怡泉公继配吴孺人墓志铭”，载《席氏世谱》（匏册）。

<sup>③</sup>《席氏世谱》（匏册）收录胡周鼐所撰“左源公暨沈孺人合传”、席本久：“考左源府君妣沈硕人行实”，其中都谈到沈氏的情况。

<sup>④</sup>《席左源公支家谱》卷2。

<sup>⑤</sup>（清）王维德：《林屋民风》卷9。

<sup>⑥</sup>（清）汪琬：《乡饮宾席翁墓志铭》，载《尧峰文钞》卷15。

谭氏，也比他小 14 岁，可惜不久就去世了。<sup>①</sup>席本楨所配四人，前两位来自本山，后两位皆江宁人氏，这与席本楨在那里的经商经历有关。席本楨有四子，即启兆、启图、启疆、启寓，除启图为谭氏所生外，其他三子皆延氏所生。席本楨有六个女儿，俱延氏所生。这里，也要提一下席本楨六个女儿的婚姻状况：长女适菱田许聚奎，次女适安仁里严宗垂，三女适吴之度，四女适漾桥郑登远，五女适同里翁天浩，幼女适菱田许广誉。<sup>②</sup>所嫁配的大多是本地大家族。

席洙在《居家杂仪》中有几节谈到家族成员的婚姻问题，如认为婚嫁不宜太早，至“十八九岁可以成婚”；对婚姻，“凡结婚必须门面相登，察其父母及婿与妇之性行良善，家法严肃，可以匹配”；有关妻妾问题，“凡正妻，父母选择合配以偕百年之好……若有子，不该娶。娶妾亦当择良善人家，性度温柔者，方可与正室相处，勿纵其志以欺正室。正室亦不可嫉妒其妾。若妾生子可以继嗣。”<sup>③</sup>席洙的这些言论在实际生活中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席洙祖孙三代的婚姻状况来看，在未经商出游前，基本局限在洞庭东山内部几大姓氏之间的通婚，方圆不过数里。后来，因远处经商，交游面扩大，婚姻受到影响，但由于大多数人成婚在先，或习惯在家乡择偶，故原配仍多东山本地人，侧室则已扩大到数十、数百里之外的经商地或流寓地。然而，不管继娶还是侧室，席家的婚姻圈实际上随着经商活动的展开而在发生变化。

对于迁徙地对宗族婚姻圈的影响，已有一些相关研究，如唐力行专门研究明清徽州社会，他在一项有关“徽州宗族的迁徙与定居活动”的专题讨论中就涉及了这一问题，他认为“对于移居者来说，进入定居地的婚姻圈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这是他们融入定居地社会的重要通道。”<sup>④</sup>洞庭席家在经商迁徙中，也存在类似情况。如左源公一支，传至席元镇，字在东，号静山，生于嘉庆年间，配青浦县朱家角杨氏，继配昆山县界贤家巷童氏，显然，他的婚姻圈已游离出东山。元镇约于道光年间迁居嘉定县北门外娄塘镇，他有三子：素洪、素澱、素治。其中，素洪配嘉定外祖父施似兰公曾孙女，继配娄塘镇黄晋甫长女；素澱配娄塘镇郭家宅郭氏。这一支子孙在娄塘镇定居置产，所嫁娶的多为娄塘镇当地人。<sup>⑤</sup>这是一个因家族成员迁徙婚姻圈发生变化的典型例子。

经商如此，席家子弟还有宦游在外的，他们的婚姻又是怎样的状态？席本楨的后代，除迁居常熟的席启寓这一支出不少文人官员，其他几房也有以官宦为生的。在席家，经常有这样的现象：如果一房无子，即由其他兄弟的儿子作为嗣子，以延续这一房。席本楨的长子启兆就是如此，他没有儿子，就让大弟启图、二弟启疆各出一子为其嗣子。启图所出的儿子叫永勋，他是启图的次子。从此，永勋就延续了启兆的香火。席永勋的第三个儿子叫席袺琢，也叫席琢，这是一个典型的官宦之家。席琢，出生于康熙十九年（1680 年），以贡生考授州判，卒于乾隆年间，敕授承德郎，配杭州府徐氏、康熙丁巳科举人内阁中书徐雯之女；继配郡城何氏、康熙二十七年戊辰科（1688 年）进士云南粮储道按察司副使何炯之女；侧室郡城龚氏。共有九个儿子，即席健、绍荀、绍莱、绍范、绍董、绍芮、绍苙、绍苍、绍葛，都“绍”字辈，其中，席健徐氏所生（所谓“嫡出”），绍荀、绍莱、绍范，俱龚氏所生，绍董、绍芮、绍苙、绍苍、绍葛，俱何氏所生（所谓“继出”）。<sup>⑥</sup>关于席琢九子的婚姻情况，详见下表：

### 席琢子女的婚姻状况

<sup>①</sup>《席左源公支家谱》卷 2。

<sup>②</sup>《席左源公支家谱》卷 2。

<sup>③</sup>（明）席洙：《居家杂仪》之“娶妇”、“婚姻”、“妻妾”等。

<sup>④</sup>唐力行：《徽州宗族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77-280 页。我们也注意到，在明清区域史研究中许多同行都对此问题有所关注，此恕不一一列举。

<sup>⑤</sup>《席左源公支家谱》卷 2。

<sup>⑥</sup>《席氏怡泉公支谱》卷 11。

| 姓名 | 配                             | 继       |
|----|-------------------------------|---------|
| 席健 | 昆山县徐氏，山西灵邱县知县徐德懋之女            | 某氏      |
| 绍荀 | 郡城陈氏，安徽泾县训导陈楫之女               |         |
| 绍莱 | 东山安仁里严氏，例授州同赠承德郎翰林院编修严有武长女    |         |
| 绍范 | 东山安仁里严氏，严明昶之女                 |         |
| 绍董 | 昆山县徐氏                         | 枉氏      |
| 绍茵 | 东山岱心湾刘氏，例授州同赠朝议大夫刑部云南司主事刘世禧长女 |         |
| 绍莛 | 郡城何氏，王垣之女                     | 郡城王氏    |
| 绍苍 | 郡城赵氏，赠奉政大夫广东潮州府南澳同知赵成秩之女      | 吴县搽泾潘氏  |
| 绍葛 | 郡城吴氏                          | 直隶天津府沈氏 |

资料来源：据《席氏怡泉公支谱》卷十一。

宦游四方，累世为官，这些席家子弟的婚姻又表现出新的特征，不仅嫁娶范围有所扩大，而且很明显他们开始注重门第。到席琢的后辈更是如此，即使对女儿的嫁配也强调门当户对。以长房席健的三个女儿为例，其中长女，适吴江县平望汪家“赠朝议大夫附贡生讳揀长福建漳州府南胜同知候选郎中”汪琥；次女，适武山葛昌发之子葛启；三女，适漾桥郑氏“浙江余姚县县丞讳启稷次子、监生”郑文照。<sup>①</sup>另外，这一支长期游离于东山故土之外，其后代也逐渐进入了所迁徙地的婚姻圈。这里，我们考察席琢第七子绍莛后代的情况。绍莛有四子六女，其中，第三子席世纓，号蕓餘，生于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配刘氏，系河南中牟县知县刘丰衍的女儿。世纓娶河南媳妇，显然与他家在河南生活多年有关，因为其父绍莛做过直隶大名府知府、河南开归陈许兵备道等官。<sup>②</sup>后来，世纓历任山东沂州府通判、济南府同知等职，他的儿子存瀛全家也迁往济南，世纓的二个女儿，其中长女适山东某知县之子，次女也嫁给当地望族。这一支此后都定居于济宁。<sup>③</sup>

事实上，翻阅明清时期江南一些大家族的族谱或其他家族资料，就会发现他们都十分注重家族的联姻。一些科举世家、簪纓之族的出现，不仅有本族丰富的财力支撑，长期的文化积淀、人文熏陶，还通过缔结姻亲关系来扩展家族的亲友圈，使家族在科场考试更具有竞争力。江苏常州的庄氏家族，明清两代涌现了不少进士、举人，其人数之多，令人惊叹。<sup>④</sup>庄氏子弟看重门第，在其所修家谱中，有一“世系录”，其中也涉及婚配情况，不少子弟的娶嫁对象出自官宦人家，早在明代就已如此。试以第8世庄廷臣的几个儿子婚姻为例：长子春先，庠生入太学，配章氏，家庭背景不详；次子瑞先，邑庠生，配江阴尹氏，湖广督学御史嘉宾女；三子履丰，邑庠生，配兴化李氏，大学士春芳谥文定孙女、礼部尚书思诚女；四子玉铉，邑庠生，配孙氏，礼部尚书慎行谥文介孙女；五子鼎铉，邑庠生，配毛氏，陕西宁州知州斌然女。<sup>⑤</sup>庄氏有训诫，其中“宜家”一条提到：“纳采之初，务择名门，勿贪财货”。<sup>⑥</sup>庄氏子弟后多尽量遵从这一族训。可见，缔结一定背景的婚姻关系，已引起当时江南不少家

<sup>①</sup> 《席氏怡泉公支谱》卷11。

<sup>②</sup> 席德济：《席氏支谱》（右源公宗系，寄寓山东济宁县），民国十一年钞本。清代大名府的辖境相当于今河北大名及河南南乐、清丰、濮阳、长垣及山东东明等县地。

<sup>③</sup> 席德济：《席氏支谱》（右源公宗系，寄寓山东济宁县）。

<sup>④</sup> 名录详见《毘陵庄氏增修族谱》卷9“科第”。

<sup>⑤</sup> 《毘陵庄氏增修族谱》卷2“世系录”。

<sup>⑥</sup> 《毘陵庄氏增修族谱》卷10“训诫”。

族的注意。

关于婚姻与门第的问题，迁居到常熟的席启寓一脉更是有长远的考虑。席启寓本人做过几年京官，也开设了不少店铺，一直在经商，在常熟曾“质贷而减其息，人咸乐趋之”，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当成是一个读书人。他广交朋友，所交挚友大多是文人。他与当时江南的许多文人有交往，“少问业于华亭叶有声，及长，与朱彝尊交，士林称之。”<sup>①</sup>其姻亲中也不乏名士，席启寓的妻子吴氏，就是吴伟业的妹妹。吴伟业（1609-1672），苏州太仓人，字骏公，号梅村。少时受业于张溥，擅诗文。明崇祯进士，授编修等职。参加复社，是晚明时期的一个活跃人物。入清，充清太祖、太宗圣训纂修官，迁国子监祭酒。后归里，博学多才。吴梅村经常到东山、常熟等地探望妹妹、妹夫及他的外甥们。席家有很多亲友住在青浦，吴梅村也多次前往青浦。其实，吴梅村早与席启寓相识，清初吴梅村为国子监祭酒，启寓还是一位监生，称弟子，后来娶其妹，才改称长兄。后来吴梅村的一个女儿又与席启寓的长子永恂成亲，更是亲上加亲。席启寓与陆陇其的交往，在当时士人中也传为佳话。陆陇其（1630-1693），浙江平湖人，原名龙其，字稼书，人称当湖先生，康熙进士，官至四川道监察御史，后辞官，平生服膺程朱理学，其学行闻名一时。自退休后，向居青浦珠里（今上海朱家角镇）。席启寓慕陆陇其之名，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备上厚礼，延请到家，课其二子，即永恂、永恪（前席）。陆氏歿，厚葬之，并聘其孙女为席永恂长子祐镛之妻。陆陇其留下了数种遗书，皆为平日读书心得，凝聚其心血，席启寓毫不犹豫，集其遗书，捐资全部刊刻于世，一时纸贵。当时坊间有盗版，启寓闻说，笑道：“我本为表彰先贤，以嘉淑后学，非为利己。”<sup>②</sup>席启寓有官场之阅历，有经商的经验，卓有远见，通过缔结姻亲，为他的后代营造了浓郁的书香氛围。

借助于婚姻圈，席家文人辈出，如席钊、席煜、席鏊、席鉴、席世臣、席世昌等，或显名于科场，或擅长艺文，在诗词书画，乃至藏书、刻书等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他们注重姻缘、注重门第，后来成为他们的家风习惯一直在延续。

## 二

从明清到近代，由内地到通商口岸，洞庭席家子弟来到上海后，他们的婚姻状况又如何变化？席正甫从东山来到上海，后出任上海汇丰银行买办，他与他的子孙主持这一职务长达半个多世纪，对洞庭席家在近代金融界地位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这里，以席正甫及其兄长席嘏卿为例，对他们两家的婚姻状况进行详细考察。

**（1）席嘏卿一支。**席嘏卿，生于道光十三年（1833年），为席元乐长子。19世纪50年代初来上海，曾从事钱庄业务，1858年入英商汇理银行，经理收付银洋帮理帐务，后改入老沙逊洋行司帐。1860年又去了英商麦加利银行，长期为该行会计司出纳。席嘏卿早在同治四年（1854年）订婚，对象乃苏州张春泉次女，张氏祖籍绍兴，后迁居苏州。那年，席嘏卿22岁，而张氏仅11岁。后因时局动荡，久未成婚。直到同治十年（1860年），才在上海陈宅结婚，时嘏卿已28岁。育有二子五女。<sup>③</sup>二子即席裕康（锡蕃）、裕照。长子席锡蕃的婚姻情况：光绪七年（1881年），娶上海马采侯之三女，马氏于1888年病故。次年，续娶东山后山顾松泉的四女儿（1903年去世）。又续宝山县罗店镇李叔士的长女。次子裕照，配同里施子霞长女。嘏卿有五个女儿，她们的婚姻状况：长女适上海谭蓉塘次子谭传洙（号沂卿）；次女适同里刘松夫次子刘昌榆（号守之）；三女适上海唐序卿三子唐文焕（号子美）；四女适同里朱怡生次子朱家瓚（号厘周）；五女适长圻陶质夫长子陶慧麟（号德生）。<sup>④</sup>

<sup>①</sup> 嘉庆《珠里小志》卷11“人物上”

<sup>②</sup> 嘉庆《珠里小志》卷13“流寓”，并见民国《吴县志》卷70上，“列传孝义一”。

<sup>③</sup> 《席嘏卿年谱》，载席裕康等撰《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民国七年石印本。

<sup>④</sup> 《席左源公支家谱》卷八。

席嘏卿的孙辈婚姻情况，以席锡蕃的儿女为例。锡蕃有三子五女，三子是德盥、德渊、德溇。德盥，字汉伯，号颂平，是席锡蕃的长子，也是席嘏卿的长房长孙，颂平配田湊里秦筱舫长女（年仅 25 岁去世），继配严良淑（系洞庭东山余家湖严子荃长女）。<sup>①</sup>次子德渊，字涵深，娶东山严仪珍，他们于 1926 年结婚。三子德溇，字济群，配东山严同珍。席锡蕃有五个女儿，其中长女早殇；次女席德芬，适胡寄梅次子筠秋；三女席德芳适叶振民；四女德萼适叶恩溥；五女德蓉适金徵五。胡家原籍安徽绩溪，而叶、金等为东山大族，他们在上海经营多年，在工商界颇有名望。

**(2) 席正甫一支。**席正甫生于道光二十年（1840 年），席元乐次子，十多岁时来上海，先后在钱庄、银行任事。1874 年，席正甫任汇丰银行买办。娶沈氏，系东山殿后沈乙舟次女，他们于同治元年（1862 年）在上海结婚。有六子：裕成（立功）、裕昆（友于）、裕光（德辉）、裕美（云如）、裕安（燕宜）、裕奎（聚星）。他们的婚姻情况：长子席立功，配吴县木渎严毓甫的长女。<sup>②</sup>次子席裕昆的妻子是东山人，为后山石桥头王汉槎次女。第三子席裕光配南浔许春荣三女，继娶上海谭月楼二女。<sup>③</sup>四子裕美，配严氏（苏州木渎严兰卿三女），继邹氏。<sup>④</sup>五子裕安，早世。小儿子席聚星，配嘉兴姚伯容的六女，继娶嘉兴人伟贞（珠宝）。席正甫另有二女，其中长女适东山后山陆巷叶子坚长子叶蕃轩；次女嫁给了安徽吴少山之子吴伯琴。

席正甫孙辈的婚姻状况，以二房裕昆（友于）、六房裕奎（聚星）的儿女为例。裕昆有四子二女，其婚姻情况详见下表：

**席裕昆子女的婚姻状况**

|    | 姓名      | 婚姻情况                         |
|----|---------|------------------------------|
| 长子 | 德薰（字伯虞） | 配陈氏，湖州大户人家。                  |
| 次子 | 德炯（字鸣九） | 配严雋兰，系洞庭东山严家熾长女；继方季文，来自宁波方家。 |
| 三子 | 德熙（字叔文） | 配王宜麟，苏州王子厚长女。                |
| 四子 | 德耀（字季明） | 孙凤兰，常熟孙直斋长女。                 |
| 长女 | 德英      | 适苏州沈伯吕。                      |
| 次女 | 德嫫      | 适无锡唐龙昆。                      |

资料来源：1、席与闰：《席氏家谱资料档》；2、席与闰口述，马学强采访整理。注：席与闰，系席德熙第三子。

六房席聚星有一子四女，儿子叫席德基，女儿分别是德瑜、德瑾、德瑶、德琳。德基于 1949 年前赴美国留学，后定居美国，娶墨西哥籍女，有三个女儿。德基现已去世。席聚星几个女儿的情况：德瑜适毛尚贞（浙江奉化人），后去台湾；德瑾适林筱富；德瑶未婚；德琳适张慕良。目前，除德瑜已去世，余均居于美国加州。<sup>⑤</sup>

席氏家谱中保存了大量有关其子孙后代婚姻状况的资料，通过对相关线索的梳理，了解到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家族，其分支众多，各支各脉的情形不一，加之职业差异、居住

<sup>①</sup> 席颂平的子女有：长女婉贞（早故）、长子与昌（字拜言）、次子与钦（字敬熙）、三子与槽（字韻樵）、四子与淦（鳌川）、幼女怀珍。参见席与棠口述，马学强、席时欣采访整理。

<sup>②</sup> 另据他的孙子席与镐回忆：“我的祖父有二个妻子。我的祖母胖得很，有二百多磅，所以，我祖父另外又娶了一个女人。”（详见席与镐口述，叶斌、马学强采访整理）

<sup>③</sup> 另据席家人口述，席裕光后娶一太太，生子德贞。席德贞后去法国。

<sup>④</sup> 席裕美有三女二子，一女早亡，其他二子：席德鉉、席德鉉，二女：席德芬、席德镁。席裕美约于 1933、1934 年病逝于上海寓所。此参见《席左源公支家谱》卷八，及席德镁女儿葛云霞口述，马学强采访整理。

<sup>⑤</sup> 席与闰：《席氏家族资料档》。

区域不同，或移或迁，或经商或为官，不同人群的婚姻选择又具有不同的目的与特点，所有这些都决定了这个家族婚姻圈的复杂性。然而，根据对已有的资料统计分析，从中可以勾划出洞庭席氏婚姻圈的大致情况，其主要的特点有：

其一，这是一个以经商闻名的家族，其人员流动频繁，具有较大的地域跨度，相对于农耕时代一些家族囿于一定地域、较少流动而言，明清时期的席家就具有交游广泛的特点。到了近代，来到通商巨埠上海，其人际关系更为复杂，凡此都体现在他们的婚姻状况上。

其二，洞庭东山席、严、叶、沈、翁、王诸大族，历来有婚姻相通的习惯，“山中著姓，世为伉俪……所重相女配夫未尝嫌贫择富，媒约一言，欣然相就……并无门户错配之患，亦无远嫁离山之女。”<sup>①</sup>受此风俗影响，席氏家族成员后来四处经营，散处各地，尽管在婚姻上选择面较广，但多数人家仍注重与本山几个大族的通婚。于是，一种现象出现了，即原配往往多为本山人，续娶则多为外地人，这在明代后期体现得比较明显。到了近代上海，面临着更为开放的环境，然而，我们发现席家的婚姻圈依然较多考虑在“同里”选择上，即使是迁移到其他地方的席氏子弟，如出生于青浦席子眉，其原配为洞庭吴氏。

其三，在一山之中，地域有限，彼此相互了解，婚配“并无门户错配之患”。但迁离故土，散于各地，在婚姻选择上就要慎重，所以，迁移到外地的洞庭席家子弟在婚姻上比较注重“门当户对”。

明清时期常熟等地的席氏子弟重视人文，故与文人名士交往频繁，互结姻亲的也多。到近代上海，洞庭席家人更多选择与工商家族联姻，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从事工商活动的，这是因“业缘”而引起的“姻缘”上的互动往来。此在席嘏卿、席正甫子孙中已有这样的倾向，而在他们的后代表现更为明显。以席正甫的第三子裕光为例，裕光的婚姻就具有这样的特点，他的原配是南浔许春荣三女，许春荣（1839-1910），浙江宁波人，早年来沪，被英商泰和洋行聘为买办，后创办了多家钱庄，并任德华银行买办等职，与席正甫一家交往甚深。席裕光有两子，即席德懋（字建侯）、席德柄（字彬如），兄弟俩在民国时期都是名声响亮的人物，德懋、德柄的子女自然是名门望族之后，与他（她）们所缔结的姻亲也要有相当之身份。席德懋有二子二女。二子为孪生，小的叫与和，未婚早世；大的叫与中，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后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娶妻潘家璜，大家闺秀。<sup>②</sup>德懋有二个女儿：长女 Ann 适梁 Solomon、二女席梅英适宋子良。宋子良的姐姐宋庆龄曾在一封信中提到过席德懋的这个女儿：“……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sup>③</sup>席德柄先娶妻黄凤珠，南浔人，1941、1942 年间死于上海。后在重庆娶欧阳宝琳。席德柄有一子七女，俱黄氏生。其子女情况：儿子席与文，曾就读于圣约翰中学，留学美国，毕业于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现居美国，未婚。德柄有七个女儿，除长女、幼女早夭外，二女、三女是双胞胎，即与昭（Lilian）、与明（Vivian），与昭后适张长春（其父张慰如），与明后适刘吉生儿子 Eddie 刘（刘鸿生侄子）。四女与萱（Florence），适 David 林。五女与时（Edith）适 Nelson 张。六女与景（Helen）适 Yi -chuan 秦。夫君皆出自沪上著名家族。<sup>④</sup>

再看裕昆次子德炯的子女们：长子与铨（Paul），大学毕业后即进入中国银行服务，被派往英国伦敦分行，后升任伦敦分行经理，配方眉娟（宁波人），迁居英国。次子与铮（Eugene），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其专业是建筑工程，曾开设建筑顾问事务所，配黄敏宜（Eugenia，

<sup>①</sup>（清）王维德：《林屋民风》卷7，“民风·联姻”。

<sup>②</sup> 席与中曾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任职，后去美国定居。与中有四子：时洪、时杰、时凯、时皓，现均居于美国。

<sup>③</sup> 沈飞德：《民国第一家：孙中山的亲属与后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sup>④</sup> 席德柄的几个女儿现都健在，其中3个在美国，两位在加拿大。参见席与闰：《席氏家族资料档》及席与文口述。

广东人)，迁居美国，有二女，时英、时莲。三子与钊（Freddie），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赴美国留学，后在台湾唐荣钢铁公司服务，配匡碧青（Monica），生有二女时雨、时芳，现均居台湾。女儿与容（Lucille），和与昭、与明一起，曾就读于著名的中西女中，后她嫁给了香港大新公司的蔡惠霖，现移居加拿大。

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人注意到洞庭山大族之间联姻的事实，认为此与东山的民风习俗有关，“姻娅联络”，这样的婚姻圈对洞庭人经商有一定好处。同时，一些人包括席家子弟自己也意识到：“同乡之间娶嫁较多，东山地方不大，席家经常在几个大姓如叶、王、严、翁等之间通婚，从现在的遗传学角度来说，可能并不太好。”<sup>①</sup>的确，我们在统计分析席氏家族资料时发现一些现象值得关注，譬如，生育年龄偏大；不少家庭是单传；席氏家庭生育子女数量相对说来较少，且以生女儿居多，等等。一房一旦遇到意外，便发生绝嗣现象，往往由兄弟的儿子过继（没有的，则有旁支出嗣），这样的例子有不少。如席元乐，这一房很特殊，所谓一房桃三房，他为“存章桃子，存涛嗣子，存恺次子。”<sup>②</sup>婚姻与家庭生活是联系在一起。

洞庭席氏作为一个世代经商的家族，其子弟常年在经营，这必然影响到他们的婚姻、家庭之组合，乃至家庭的生育、家庭的结构，等等。这是一个以经商为职业的家族，在一个个分散的家庭中，男人经常经商在外。这样的家庭模式通常是：男人在外面经商赚钱，多年在外；妇女在家乡主持家庭事务，承担抚养孩子，孝敬公婆的责任。可以说，这种婚姻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责任。洞庭山“田少人多，居民纷纷远贸，惟留妇女守家，其风颇与新安相近。”<sup>③</sup>席氏家谱中同时也收录了不少席姓子弟撰写他们母亲、祖母的“行状”、“行略”，内中记述了席家妇人的事迹。随意翻阅数篇，如一篇《先祖考养虚府君暨先祖妣俞孺人行略》，写到他的祖母：“幼秉家型长嫔垂范，及笄归祖父，庙见之后，遂脱簪珥，粗衣淡妆，躬亲操作，相父教子……我祖方谋废举，苦无以为资，即斥嫁时装，以佐什一。”<sup>④</sup>这位妇女在席氏家族中颇具典型性。男人常年在奔波，所以在家族的生活中妇女起着重要作用，她们默默地肩负着家庭的职责，照顾公婆，养育子女，既为媳当母，又要尽那份本该属于丈夫的义务，辛苦劳顿。当年席元乐到昆山做典当生意，一年只回家几趟，平日家务均由其母亲邱氏、妻子金氏主持。金氏乃东山金塔村监生金熙和孙女、金毅斋三女。在有了儿子席嘏卿后，原来请了一位奶妈，后金氏为了维持家计，亲自乳哺，“以节糜用”。<sup>⑤</sup>几年后，金氏因操劳过度，“积劳致病，体日羸瘦”。不久病歿，年仅36岁。<sup>⑥</sup>留下二儿一女，二儿即席嘏卿、正甫。次年，席元乐继娶沈氏，为东山岱心湾沈震初孙女、孙聚堂的次女，也就是后来沙逊洋行买办沈二园的妹妹。此后，沈家与席家关系密切起来，席嘏卿、席正甫兄弟后来能在上海立足，就与沈二园这位舅舅有很大关系。

洞庭席氏家族的婚姻圈注重与同乡大族的联姻，是基于多种考虑与选择，既出于对家庭的现实需要，男子经商在外，妇女主内，赡养父母，养育子女，而大族之间互结姻亲，于地方上可以相互照应，多方关照。同时，在经商中也有相互提携，互相援引的一面，利用姻亲的关系，“父子相承，传为世业，旁及戚娅”，将血缘、姻缘、业缘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一个最典型的表现，在近代形成了以洞庭东山席氏为核心的著名银行买办世家。在这个家族中，不唯席元乐次子的席正甫这一房当买办者多，其他几房，大房席嘏卿（其子席锡蕃）、三房席缙华及过继给沈二园的四子素恒（即沈吉成），出任买办者也众。于是，便形成了以席氏家族为中心，洞庭山诸大族互相援引，利用亲戚、同乡的关系，结成一个颇具势力的“银行

<sup>①</sup> 席与闰口述，马学强采访整理。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席家中并不少。

<sup>②</sup> 《席左源公支家谱》卷8。

<sup>③</sup> （清）程思乐：《太湖风土论》，载《太湖志略》。

<sup>④</sup> 《席氏世谱》（苇册）载记十“养虚公”。

<sup>⑤</sup> 《席嘏卿年谱》，载席裕康等撰《洞庭席嘏卿先生言行录》。

<sup>⑥</sup> 《席左源公支家谱》卷8。



买办集团”。洞庭席家有数代，如果加上几个女婿，计有十多人，先后在上海的汇丰、麦加利、有利、德丰、中华汇理、宝信、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住友、运通、美商信济、德华、华比、中法工商、华义、华俄道胜等主要外资银行担任买办。

这里，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与席氏有姻亲关系的那些买办们，如许春荣、胡寄梅、王宪臣、叶振民、胡筠秋、叶明斋等。许春荣做过德籍德华银行买办的，他的女儿就嫁给了席正甫的第三个儿子席裕光。许春荣，1839年生于浙江湖州，原籍宁波，1867年在沪与宁波翁氏开设大丰洋货号，这是当时上海第一家经营进口洋布匹头的本国商号。1850年许春荣被英商泰和洋行聘为买办，该行经营猪鬃、洋纱匹头及机器等进出口贸易，许又以大丰号老板的身份承购他负责推销的商品，因此业务十分兴旺。许春荣创办了阜丰、鼎丰、通余、通源等七个钱庄。1889年，许春荣以钱庄老板的身份充当了上海德华银行第一任买办。许家与席家数代关系密切。席嘏卿的儿子席锡蕃，自己先后担任过麦加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中法工商银行的买办，而他的女婿中也出了多位买办。他共有五个女儿，其中，次女德芬适胡筠秋，胡筠秋原籍安徽绩溪，他的父亲胡寄梅，很早就来沪经商贸易。胡氏父子，寄梅先后为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买办，1901年离开道胜银行，次年去当了比利时华比银行的首任买办；胡筠秋后继任华比银行买办。而日商三菱银行的买办胡筠籛，便是胡寄梅的长子。席锡蕃的三女席德芳适叶振民，叶振民也来自洞庭东山，当地望族，曾任中法银行买办。这些买办家族，或为世交，或缔姻亲，彼此照应，社会活动能量极大。

这里的社会关系盘根错节，以席嘏卿、席正甫的弟弟素荣为例，从中能说明一二。席素荣，字缙华，席元乐第三子，生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与他的两位哥哥一样，席素荣起先也在上海的钱庄学生意。从小生活在动荡的环境里，使他很早就养成一种机警的性格，同时也比较沉稳，独立性强。在席正甫做汇丰银行买办不久，他去汇丰的买办间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的几年的经历，诸书记载略有出入。有一种说法，席素荣做过德丰银行的买办。德丰银行（National Bank of India），于1875年设立，系英商银行，聘席素荣为买办。<sup>①</sup>另一种说法是，席素荣是在德华银行当买办。<sup>②</sup>1889年，席素荣又到有利银行充任买办。从1903年起，席素荣出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素荣先后能在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当买办，一方面与他长期在外资银行的经历有关，另一方面，则显然与他们家的亲戚胡寄梅有很大关系。因为胡寄梅也先后为有利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的买办。事实上，席素荣的舅母是胡寄梅的姑母，后来席家与胡家又有姻亲关系，可谓亲上加亲。在华俄道胜银行做了近5年买办后，席素荣于1907年又将这一职务交接给了他的大侄子席锡蕃。席素荣有四女，其中，长女嫁给叶明斋。叶明斋是晚清民初的一位著名人物，籍贯洞庭东山，出生于上海，早年毕业于英华书馆（the Anglo-Chinese School），后任上海横滨正金银行（Yokohama Specie Bank, Ltd.）的买办。“他是一位具有进步的现代理想的典型中国绅士……他对很多企业都有兴趣，并且是龙华制革厂、振华纱厂、公平人寿保险公司以及中外协会的董事。”<sup>③</sup>

这样的婚姻结构与社会关系，不仅直接影响到东山的社会结构，对东山大族之间的经营活动也产生广泛影响。无论明清还是近代，不论在南京、长沙、临清抑或是在上海，在洞庭商人经营的行业中，翁婿之间，甥舅之间，家族与家族之间，业务往来，在资金周转、相互参股，合作经营等方面，屡见不鲜。在这样的经营网络中，千丝万缕的姻亲关系起了很大的作用。

从明清到近代，洞庭席氏家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首先，在活动区域上，最明显

<sup>①</sup> 吴培初：《旧上海外商银行买办》，载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4页。

<sup>②</sup> 张仲礼、陈曾年：《沙逊集团在旧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37-138页。

<sup>③</sup> *Twentieth Century Impressions of Hongkong Shanghai, and other Treaty Ports of China: Their History, People, Commerce, Industries, And Resources. Editor-in-Chief: Arnold Wright, Lloyd's Greater Britain Publishing Company, LTD. 1908. P.540.*

的变化是向大中城市集聚，除大量懋迁来沪，移居上海外，在其他区域经商的席家人也纷纷转向城市，从江淮各地、沅湘之壤，而向南京、武汉、长沙等城市集中。其次，为适应近代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多数席家子弟不再单纯从事货物的往返运送，而转向开店设铺。其趋势是坐贾增多，行商渐少。第三，在资金流向上，传统时代的资金流向单一，大量资金只在商业领域内进进出出，到了近代，其资金出路复杂而多样，有继续从事传统贸易活动的；有转投金融业，开设钱庄、银行的；也有开始投资于近代工矿业，以及像房地产这样的新兴行业。席氏子弟的婚姻圈、婚姻观念等也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出现变化。然而，从席家子弟的经营事例以及实际利用的社会关系中，也可以看到很多传统的东西仍然发挥着作用。在洞庭席氏家族编织的社会网络中，姻亲、同乡关系始终是最基本的，可以认为是家族庞大关系圈中比较稳定的部分。无论是他们经营钱庄任用人事中的父子相承，旁及戚娅、同乡，还是在外国银行买办职务的相互转让，职业场上的彼此攀援，生意之间的互相帮衬，都反映出他们对姻亲、同乡的看重与依赖。从席氏家族的婚姻背后，透视出来的不仅仅是姻缘本身的问题了。通过对该家族成员婚配情况的了解与分析，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窥见传统江南社会的内部结构，以及在向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特点。